

海上异托邦

——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

吕超◆著



黑龍江大學出版社

海上异托邦

——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

吕超◆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吕超著.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81129-327-2

I. ①海… II. ①吕… III. ①上海市—研究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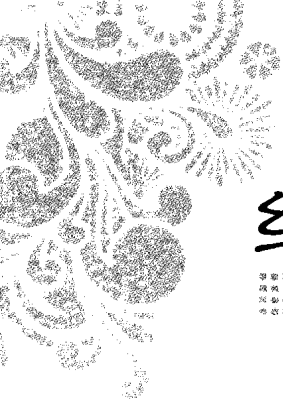
①K9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1796号

书 名	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
著作责任者	吕 超 著
出 版 人	李小娟
责 任 编 辑	管小其
出 版 发 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 邮编 150080
网 址	http://www.hljupress.com
电 子 信 箱	hljupress@163.com
电 话	(0451) 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80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9-327-2
定 价	2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论

这里的数据是虚构的，目的是为了测试排版效果。正文内容如下：2005年至2008年，笔者曾在上海求学三载，但博士生清苦的书斋生活似乎和这座都市的繁华气息格格不入。除了去周边院校听讲座和外出购买图书之外，我平日很少在上海的街头闲逛。博士毕业后，我按照三年前制订的计划返回天津教书，本以为自己和上海的“因缘”就此了结，可未曾料到对这座城市的怀念却刚刚开始。

探秘“海上异托邦”

2005年至2008年，笔者曾在上海求学三载，但博士生清苦的书斋生活似乎和这座都市的繁华气息格格不入。除了去周边院校听讲座和外出购买图书之外，我平日很少在上海的街头闲逛。博士毕业后，我按照三年前制订的计划返回天津教书，本以为自己和上海的“因缘”就此了结，可未曾料到对这座城市的怀念却刚刚开始。

也许对于我来说，上海属于那种只有在离开之后才感触更加深切的地方。在此后的两年间，我陆续赴香港、美国加州等地求学，结识了一些曾到上海游历的国际友人，他们对上海绘声绘色的描述不断勾起我的海上旧梦——在时光的流转中，一切都变得韵味悠远，就连当时撰写论文的焦灼岁月也都成了温情的记忆。

在将自己的体验与外国友人的叙述对比之后，受制于文化传统和个体经历等因素的影响，我总能发现不少差异之处，而这也正是促使我撰写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我的海上旧梦毕竟只属于个人体验，并不足以向外人道也。相对而言，研究外国(尤其是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形象却是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非常值得当代学者去开拓探索。

众所周知，文学与城市的关系十分密切，从城市诞生之日起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学术界逐渐重视这一跨学科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特别是针对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个案分析，如国外的罗马、

耶路撒冷、巴黎、伦敦、纽约和国内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不过，综观已有研究成果，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论述本土作家描写本土城市的文学作品，而对作家描写异域城市的作品研究则相对薄弱。其实，每一座世界性的城市都曾经是异域情调描写的主要对象，纵观人类文学历史，相关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让人颇觉可惜的是，论述城市在异域文学中形象的研究成果却乏善可陈。以百余年来中国最具国际化的城市——上海为例，虽然如今已经形成蔚为壮观的“上海学”，但许多学者依然是只关注中国作家笔下的上海形象，很少深入系统地研究外国文学中的上海形象。

另一方面，过去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解读涉及中国题材的相关作品时，习惯将论题定位在“作品的中国形象”这一宏观层面，很少细致分析个案城市，这是历史责任使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当今学者有必要改变这种削足适履、捉襟见肘式的研究方法，应根据具体作品把所谓“铁板一块”的中国整体形象进一步细分，挑选代表性城市作为重点研究案例——毕竟各有特色的中国城市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并非完全一样。近年国内也有学者论及这一课题，但坦率地说，大多是零星涉猎，甚至个别文章还出现文献翻译、史料考据方面的硬伤，这不能不说是大遗憾。笔者曾针对北京的域外文学形象出版专著论述^①，其实上海的域外文学形象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文学遗产，亟待后继学者去发掘整理，用有别于传统的新视角来诠释相关“文本”。

为了让读者更形象地理解城市的异域文学形象这一研究领域，笔者不妨在此先列举几例西方人对中国城市的评价。早在19世纪中期，有英国学者这样对比上海和广东的差异：“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的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对于排外运动，广东人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对于外侨曾表示强烈的憎恶；如果他们对于外侨能够

^① 参见《东方帝都：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表示冷淡，我们就认为很好的了。而上海人呢，虽然他们不是本性上愿意和外侨亲善，但至少愿意和外侨作半推半就的接近。”^①进入20世纪之后，又有一些西方人将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和上海进行对比，譬如英国作家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在其长篇小说《牡丹和马驹》（*Peonies and Ponies*，1941）的开篇中写道：北京是快乐的所在，并且这种快乐和上海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北京是一种本土的、自然的快乐，而上海则是舶来的、人造的快乐”^②。与此相对照，喜欢老上海的西方人并不一定欣赏老北京，如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纽（Christopher New）的长篇小说《上海》（*Shanghai*，1985）中的主人公丹顿，他在游览北京之后大失所望：残壁颓垣的庙宇，懒散的和尚，人造的湖泊，还有那灰蒙蒙的狭窄胡同，以及凌乱的四合院，甚至包括紫禁城、天坛等文化景观，在丹顿看来，北京的每一件东西都象征着停滞和冷漠。比较而言，他更喜欢上海，上海的一切都充满活力，而北京却像一家死气沉沉的博物馆。^③再如瑞典学者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游历了北京和上海，并各有评价：“尽管北京经历了如此众多的变化，世界上仍没有哪一个具有100万人口的城市，能像它那样保留着中世纪的容貌，无论是人们的生活，还是城市的外观。在这座不平凡的城市上空，始终徘徊着伟大的幽灵，它具有超然高贵的气质和极强的感染力，使来访者为之震撼。北京是我最喜爱的城市之一。”^④与北京形成鲜明对照，“今日的海，与从前相比，更像一座西方城市了，确切一点说，很像一座美国城市。这里人口密集，街头巷尾喧闹不息，东西方文化混杂，使人置身于此，犹如置身女巫施展魔法的大锅。每到一处，对金钱的狂热追求声都强烈地冲击着耳膜。到处是宏伟的商业大厦，到处是坚固的公共建筑。巨大的百货商店与街头小店，银行、旅馆、剧院、情人幽会的酒吧，挤在一起，一眼

① [英]兰宁、柯灵：《上海史》第34章，译文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53页。

② Harold Acton, *Peonies and Pon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

③ Christopher New, *Shanghai*, London: Macdonald Co., 1985, pp.267-268.

④ [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徐十周等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2页。

望不到尽头”^①。不言而喻，斯文·赫定对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的评价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上述案例都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不同城市的形象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随着地域文化特色而改变。

本书以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一百六十年来上海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这座城市曾被世人誉为“东方的巴黎”和“西方的纽约”。在西方文化中，“Shanghai”这一单词有着特殊的魅力，它甚至成了贬义的动词，意思是指把某人击昏或用酒灌醉，随后贩卖到需要人手的海船上；或者用欺骗的手段让别人做坏事。^②一个城市的名称被当做动词来使用，这在世界文学史、城市史、文化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另外，西方人模仿单词“New Yorker”（纽约客）创造了“Shanghaiker”（上海客）一词，虽然词缀相同但意思却大不一样，“上海客”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专指那些善于敲诈勒索的，属于社会底层或黑恶势力的不法分子。“Shanghai”和“Shanghaiker”这两个单词所蕴涵的贬义早在19世纪就开始流行，相对而言，人们对上海在异域文学中形象的研究则明显落后了。

为了勾勒出西方文化中上海形象的流变情况，本书主要处理的是西方作家撰写的，影响较为广泛的游记、小说、诗歌，以及相关的影视作品。笔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搜集相关的文献材料，其间也寻得一些可供参考的文集汇编类图书，但一直未见有全面梳理上海域外文学形象的研究成果。^③譬如芭芭拉·柏克（Barbara Baker）曾将十余位西方作家描写上海的作品摘录后汇编成书，命名为《上海：一座充满刺激的花哨城市》（*Shanghai: Electric and Lurid City*）并出版。^④作者在“序言”

① [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徐十周等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8页。

② Stella Dong, *Shanghai: 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1842—1949*,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0, p. 2.

③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关于上海的博士论文已达300多篇，正式出版的著作不下50部。参考熊月之、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该书附录了国外研究上海的专著和博士论文，但未见系统的上海形象研究。此外，日籍学者刘建辉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甘慧洁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可供参考，主要论述日本知识人对近代上海的认知。

④ Barbara Baker, *Shanghai: Electric and Lurid City: An Antholog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对上海域外文学形象的概括颇为到位，认为“上海拥有着不同寻常的多彩历史，其中充满着令人惊奇的悖论和极端特性。在这样一座独特的城市中，杂糅炮舰外交、鸦片、华懋宾馆的下午茶、拥挤街道上的饿殍；在这里，匪徒、知识分子、卖淫者、高端时尚品、暴动和革命、资本主义和实业精神都共存着。这座迷人的城市给许多作家提供了创作灵感”^①。但遗憾的是，编者并没有进一步深入阐释，所选作品的时间跨度和影响力也有待进一步商榷。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始终以异托邦（Heterotopia）理论为指导。过去学术界在研究异域文学形象时，习惯套用乌托邦（Utopia）理论来阐释，这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细究，无论从词源来说，还是从文化史层面来看，乌托邦都是指一个虚构的、不存在的地方，基本特征是“不在场”（non-presence），它既不存在于时间内的某一瞬，也不存在于空间里的某一点。因此，用乌托邦理论来阐释一个现实中确实存在的异域或异族形象难免不妥。比较而言，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提出的异托邦理论更为贴切，它是根据“utopia”创造出来的，“hetero”意为“其他的”，“topia”意为“地点”，合称则指一种现实存在的、不同于自我的他者空间。这一理论因其新颖，学术界鲜有探究，虽则研究难度较大，但也更具开拓性意义。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特意将文学中的异域城市形象简称为“城市异托邦”，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形象自然也属于这一研究课题，并可以简称为“海上异托邦”。

毋庸置疑，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形象在塑造过程中，无法避免东方主义的“过滤框架”。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来说，“制作一个异域‘形象’时，作家并未复制现实。他筛选了一定数目的特点，这些作家认为适用于‘他’要进行的异域描述的成分”^②。因此，本书所要研究的上海形象并非现实的简单复制品，而是作者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和心

^① Barbara Baker, *Shanghai: Electric and Lurid City: An Antholog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Introduction, xiii.

^② [法]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参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理预期重新塑造的城市异托邦。毫不夸张地说，在西方文化史中，上海甚至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和套语，影响着社会大众对东方城市的集体想象。这就要求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首先辨析清楚：哪些元素是客体城市本来就拥有的，哪些元素则是叙述者虚构出来的。

在分析具体作家作品时，阐释的深度和精准度也尤为重要。西方文学中的上海形象作为一个城市异托邦，存在于作家们的文本叙述中，是一个生发幻想和表达欲望的地方，在这里，真实的城市空间和虚构的人物事件相互交融。任何一部作品所塑造的上海形象，无论虚实多少、真假如何，其背后都蕴涵着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也都凝结着叙述者的态度。如何合理把握并细致解读这一形象背后的文化取向和叙述策略，既是本书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此外，从叙述的角度来看，西方文学对上海形象的描写，尽管有时难免流于误解或肤浅，但这些作品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将光怪陆离的上海视作异域传奇发生的背景性城市。西方作家们对上海形象的描述是一种精心选择的结果，他们总是特别关注一些地方和事件，而其他的则被巧妙地排除于作品之外。上海那些强烈吸引中国作家的现代性特征，或者被西方作家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可以说，西方文学中的上海是一座“双向陌生”的城市：西方人感觉陌生，因为对他们而言，其中充斥着异域情调元素；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感觉陌生，因为这不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上海形象。这意味着，读者在阅读此书时需要一种“批判”的眼光。

一般而言，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异托邦形象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基于三个要素：异域的现实；本土的文化心理；异域与本土的关系及受其影响的文化视阈。这三个要素互相渗透，并通过作者叙述整合为一体。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形象也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历史中上海的真实面貌；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双方政治经济关系所影响的文化视阈。有鉴于此，本书在纲目中将上海的异托邦形象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的“小荷初露”，20世纪前期的“容颜百变”，以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明珠溢彩”，三者之间既有变革也有传承的关系。

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形象体现出不断成长的特点。开埠之前，来上海的西方人大多将这座“东南都会”视作一处有潜力的对外

贸易港口，并未有太多特别之处。开埠后的上海迅速成长，很快成为“远东第一商埠”，甚至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其城市异托邦形象也逐渐脱离国家的整体形象而独立存在。然而，时尚奢华的背后是迅速滋长的“恶之花”——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泛滥。发展到世纪之交，整座城市则呈现出分裂的精神特质：繁华与贫穷、文明与蛮荒、西方与东方共生并存。

20世纪前期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形象是一座畸形繁荣的城市，被称做“冒险家的乐园”。与茅盾、穆时英等中国作家笔下常见的摩登景致形成鲜明对比，此时西方文学中的上海大多是混乱、堕落、疯狂的城市。西方人很少描写这里的声光化电、高楼大厦等现代都市景观，反而更关注落后、脏乱的角落，租界与华界的空间杂糅现象隐喻了一座“马赛克”城市。在作品中，旧上海原住民的形象大多是狡黠而残暴的，女性则是妖媚、感人的；外国人则常常被描述为冒险家，终日在这座充满诱惑的城市中追寻享乐，放纵欲望；异质文化间碰撞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西方文化腐蚀、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期待异域情调的西方人而言，这也正是所谓“魔都”的妖娆魅力所在。

1949年之后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形象呈现出阶段性演变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之前，新中国的上海作为一个独立的都市形象并不突出，洗尽铅华的“十里洋场”虽有旧时代遗留下的韵味，但许多风貌已被历史的新气象遮蔽。这一阶段的上海形象裹挟着“红色中国”特征，许多作品的叙述深受西方社会仇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影响。1992年之后，随着上海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这座城市繁华、艳丽的形象也逐渐恢复，重新成为一座充满着机遇、活力、冒险和浪漫情调的东方城市。当然，这并不是旧上海形象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多重因素的砥砺下更具包容性和复杂性。

顺便说一句，外国人对中国城市的研究模式和成果也影响着中国人的看法。譬如，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认为：“上海，连同在近百年来的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物的钥

匙”^①。由此，上海是“钥匙”一说被广泛引用，已成为学术界与民众公认的结论。

总之，笔者力图通过本书的论述来抛砖引玉，为喜爱上海的读者们呈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海上异托邦”，并进而为当今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毕竟西方人看上海，由于审美标准、文化背景等差异，能够描绘出中国人所不留意的景观风俗和文化现象，而这些都是同时代的中国文献所未必记录的，因此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参考价值——只要我们具备“批判”的眼光。

^①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页。

上海正式开埠前夕，英国人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1813—1880）来到此地。他将上海与广州比较，认为在地理、气候、人文等各方面，上海都比广州更具有对外贸易的优势，“无疑在不久的将来，它不仅仅是和广州的竞争问题，它将成为一个远为伟大、重要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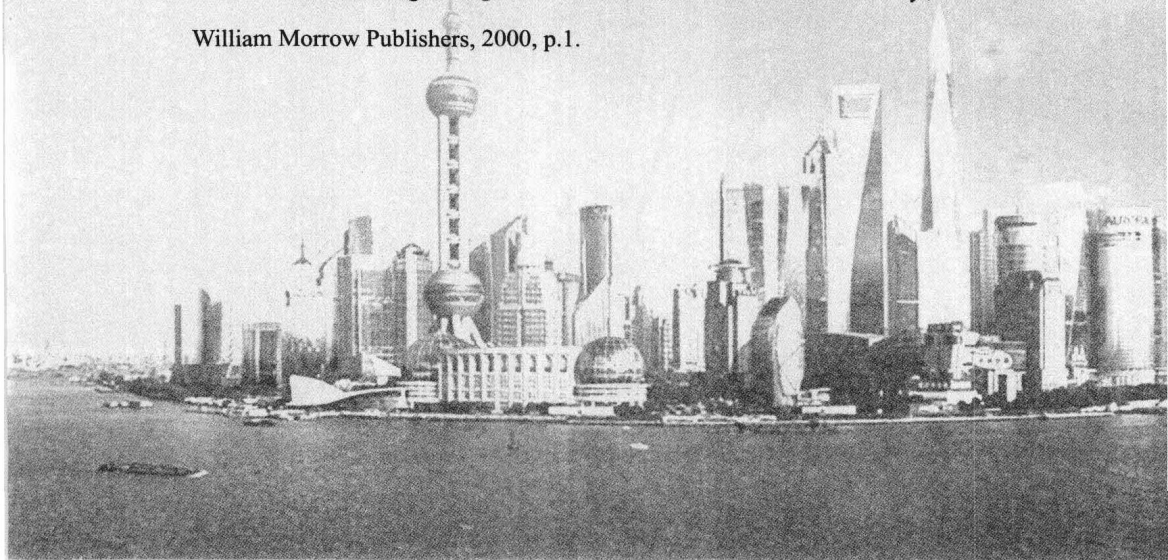
——Robert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47, p.196.

美国旅行家弗兰克·卡彭特(Frank Carpenter)曾先后五次来上海，在19世纪末预言上海的未来：“立足于经济和生产，这个城市在中国是最重要的。在铁路网的连接下，上海将迟早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财富和人口方面成为纽约、伦敦、柏林、东京的强劲对手。”

——Barbara Baker, *Shanghai: Electric and Lurid City: An Antholog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4.

面对上海的阴暗面，一位曾经在此地工作的英国牧师发出了这样的诅咒：“如果上帝让上海长期存在下去，他就得向撒旦和蛾摩拉道歉。”

——Stella Dong, *Shanghai: 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Publishers, 2000, p.1.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探秘“海上异托邦”	1
---------------------------	---

第 一 章 小荷初露（1831—1900）

第一节 “东南都会”	3
第二节 “远东第一商埠”	10
第三节 “恶之花”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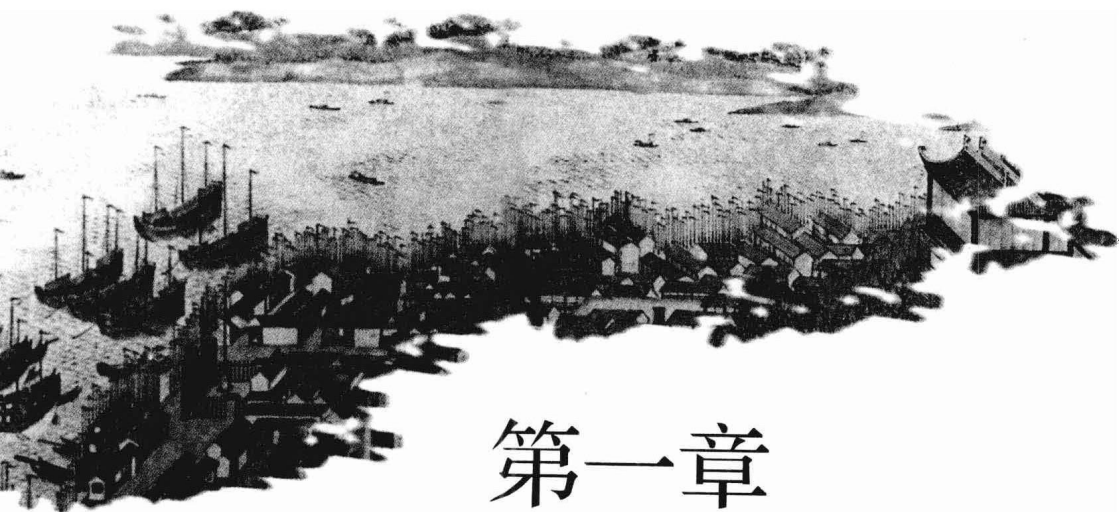
第 二 章 容颜百变（1900—1949）

第一节 “东方巴黎”繁华录	31
第二节 “冒险家的乐园”	40
第三节 “马赛克”空间	60
第四节 “上海人”	74
第五节 战火中的城市	91

第 三 章 明珠溢彩（1949—2010）

第一节 洗尽铅华	107
第二节 巨龙昂首	121
第三节 万种风情	138

附 录 关于上海的外国电影统计表	151
参考文献	155
后 记	163



第一章

小荷初露

Xiaohe Chulou

(1831—1900)

第一节 “东南都会”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上海镇设立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到元代已是“蕃商云集之巨镇”。^①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朝廷批准设立“上海县”，此时中国与日本、东南亚一带的贸易往来多在此出入。明代开始有倭寇骚扰，正德九年（1514年）以后又有欧洲海盗式商人、冒险家来到中国沿海港口肆虐，明朝政府便下令实施海禁。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海建起卵形城墙，以保护居民不受海盗侵扰^②。到了清朝初期，为了剿除沿海抗清势力，更是厉行海禁，上海的对外交流受到严格抑制。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部分解除海禁，在上海设江南海关，上海的海上贸易逐渐复苏，常有日本、朝鲜和南洋商船来往。雍正七年（1729年）海禁完全解除，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到嘉庆年间，上海已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之称。



上海老城的古地图

^① 参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页<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9969/node69972>，2009年1月。

^② 县城南北纵深约2.5公里，东西宽约1.5公里，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上海老城才被陆续拆毁。

关于西方人在上海从事文化交流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当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Lauzaro Catneo, 1594—1640）应中国士人徐光启的邀请来上海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致力于基督教的传播事业。可惜的是，尔后两百多年间，上海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近乎断绝。

直到1831年8月，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 1803—



鸦片战争之前的上海（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中国画）

1851）来到上海，他在航行记述中把上海称为“富庶的土地”，“南京和整个江南省的贸易中心，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主要商业城市”。^①在郭士立看来，上海的经济价值要远远高于传教的价值。教士不以传播教义为重，却倾心商业贸易，这或许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侵入此地的前奏。果不其然，在九年后的侵华英军队伍里便活跃着郭士立的身影，他作为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官，参与了《南京条约》签订的整个过程。

^① 参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页<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9969/node69972>，2009年1月。